

王易先生国学治学方法述略

段晓华, 赵宏祥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 王易先生是原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前身)文史系学术成果最为丰富的教授,在国学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从王易发表于《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的《治国学之方法》一文入手,结合其《国学概论》等著述,回顾和讨论王易的国学治学方法。

关键词: 国学; 国学四区; 国立中正大学校刊; 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6-0114-04

A Survey of WANG Yi's Research Methods in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DUAN Xiaohua, ZHAO Hong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Abstract: As a learned professor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The precursor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the great scholar WANG Yi achieved very high attainments in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Studie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combined with his introduction to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reviews and discusses WANG Yi's research methods in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four parts of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search methods

1940年,在抗战艰难岁月中,中正大学创立于江西泰和,王易先生出任文史系主任。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胡先骕,既是我国植物分类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同时深浸传统文化,是学衡派的领袖人物。胡先骕在中正大学贯彻的是通才教育的理念,尝谓“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1](p423)]所以中正大学在建设,一方面注重培养各领域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非常重视国学教育,使进入中正大学的学生,既能在科学中有所作为,同时也能“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2]并且还创办了以弘扬“学问盛典,心思道术”^[3]为宗旨的《文史季刊》,刊载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著述。当时的中正大学文史系,可谓名师齐聚,教授王易、欧阳祖经、程臻、姚名达等,皆为治学严谨、根基深厚的文史学者。这其中,王易先生犹以笔耕不辍为驰名。

王易(1889~1956),字晓湘,号简庵,江西南昌人。1912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先后任教于心远大

收稿日期:2012-06-07

基金项目:2012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立项项目“近代江西学人王易研究”(项目编号:YC2011-S025)

作者简介:段晓华(1954-),女,江西萍乡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献学、古代文学。

赵宏祥(1987-),男,山西山阴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献学。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正大学。^①其父王益霖,曾任三江师范经学教习,擅长旧学而又能求新求变,对西学亦有研究。王易幼承庭训,及长入京师大学堂,又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对于国学有着宏富而深刻的识见。其《国学概论》、《词曲史》等著作,为学界所重视。在中正大学任教时期,又先后在《文史季刊》、《国立中正大学校刊》上刊发了多篇学术论文,本文拟通过对其中部分相关著述的分析和讨论,回顾王易先生的国学治学方法。

一

在近代学人中,王易先生虽不是第一个梳理国学概念的学人,但在其出版于1933年的《国学概论》中,将国学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定义为经学、小学、哲学、史学四区,相较章太炎先生提出的国学的的内容须包括: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4][p9]}归纳得更加明确系统,王易先生认为:

夫为学贵夫识体,而致力务在知方。上述四区,国学之体也;苟不知方,则犹泛舟而昧于帆柁之施,解牛而迷其肯綮所在矣。^{[5][p6]}

将传统学术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进行分类,对于理解国学的内涵和学习国学的方法,大有裨益,所以,王易先生首先强调的即是这个问题,那么学习国学的门径之要,在于知道“体”和“方”,“体”即是国学的内涵,“方”则指学习国学的方法。

国学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王易先生理解中,国学就是中国之学,在《治国学之基本方法》中王易先生进一步指出,国学既是“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演进之事迹”,所以王易先生认为“凡所谓学,包括一切学术知识,故国学实为我国悠久历史诸学之总汇。”^②这里讲的诸学,包括文史、典章、天文、历数、音律、医学等等,是广义上的国学,而通常意义上我国传统学术,也就是狭义的国学,则在于经史子集四部,也就是王易先生所提出的国学四区。

虽然在五四运动等思潮中,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使国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作为文化本位之载体,民族精神的寄托,有识之学人对其从未轻视和贬斥,反而积极整理和弘扬,使以传统学术为内质的国学能够顺应时代,保存和延续。然而在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冲击中,传统学术教授学习的方法,已经渐次与新兴的现代教育体系脱节,所谓学问既不见于闾巷庠序,其薪火也实难为继。由于教育体系方法上的变化,西学与国学此消彼长,“中学之体”的自信,渐次消颓,那么学习国学,继承国学,对于国人更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的学习,是以明了所学的内涵为开始的,王易先生的国学四区,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援入现代学科理念,使国学的概念和内涵,变得十分明晰。

二

明了国学的内涵后,掌握研治国学的基本方法,便成为了继承国学的首要问题。王易先生认为,掌握国学之方法,关键在文字学、目录学、学术史三个方面。文字学,又称小学,本是附庸于经学,为解经之用,后来演化发展至一大学科,其内容为文字之源流、音韵、训诂。有清一代,小学发展尤为勃兴,出现了戴震、王念孙、钱大昕、段玉裁等大家,基于这一代学者繁富而宏深的成果,小学日趋精密而完备。治国学首先应由小学入手,因为经过上千年的演化和发展,汉语的字型、字义、音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中又有汉学、宋学之分,也就是考据和义理之学,如果不能解决文字本身的含义,就难以进一步考辨和阐发,可见小学即是一门内容精深的学问,同时也是学习国学不可或缺的工具,诚如王易先生所言:

书契既兴,文明甫兆,尉律始试,讽籀九千,识字读书,事原一贯。顾形异古今,体殊篆隶;音歧南北,言分疾徐;义训衍转,随之不穷,通塞是非,难期遽瞭;兼之通假杂出,譬况纷陈,书写流传,愈滋讹替。夫

^① 王易于1941年出任中正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主任,1946年,中正大学迁南昌望城岗,成立文学院,王易出任文学学院院长,至1949年春,迁家长沙。见范予《王易先生传略》,政协南昌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南昌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9年。

^② 见王易《治国学之基本方法》,《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2年,第二卷第二十三期。这篇文章是1942年5月,王易先生在中正大学文史系三四年级座谈会上发表的演讲。

是正形体,自有许书;上溯渊源,必参古籍;鼎彝甲骨,乃其辅车。推究音声,同宗《切韵》;寻求反纽,咨采方言,佉、梵注音,相为印证。会通义训,发端《尔雅》;比附传注,检校韵书,事物形声,并归炉冶。三事咸集,义理易昭,用治国闻,庶无扞格……^[3]

其次目录学、学术史,一在横向,一在纵向,是研究国学的经纬。目录学旨在通晓学术的积累和传承,是国学的横向维度。目录学著作,分类严密,提要撮精,进入一个目类,实际是进入一个学术分支,可以发现前人学术累积的各支成果,通过对前人成果提纲挈领的研究,可以直达前人的研究前沿,发覆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或者查漏补缺,弥补前人研究的薄弱方面。学术史,即是传统学术名词中所谓“学案”者,是国学的纵向维度。通过对学术史的考察,可以总结历代学者治学思想,掌握他们的治学方法,进而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如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道“有思潮之时代,必昂进之时代……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6] (p10)} 学术思潮前后衔接,扬弃与新变,往往是催生和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明清鼎革之际,清初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进行了反思,由崇尚义理清谈的学风,转向专注于考据辨析,择善而从,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以朴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写道:

由衰复盛,非一朝可至,由近复古,非一蹴能几。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7] (p305)}

可见,学习国学,不仅要研读国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学术嬗变,所引发的理论、方法,更是学习国学需要深思的。故王易先生指出,考察学术史则“吾人读之可易明其系统,收事半功倍之利”(《国学概论》)。学习国学,从学术史开始,理清各种学术流派、学术思潮之基本情况、产生发展,正本清源,从而勾勒出国学四区的一个清晰的框架,并由此框架,进入系统性的国学学习。

三

在《治国学之基本方法》中,王易先生把学习国学的目标阐释为征实和致用,他指出:

治国学者门径既明,当认定二目标,一,征实。吾人研究任何学术,均须抱求真之态度……二,致用,凡学皆求其所以致用。吾人精研国学,须使国学发挥其功用于社会国家,然后不致徒作蠹鱼。(《治国学之基本方法》)

征实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学问,既不拘泥古人,同时也不否定推翻古人,在经学、史学、哲学、小学这些前人已经做出的巨大成就中,后来学习者既要吸收利用,同时也应注意前人考辨的疏失。以科学的方法,笃实的精神治学,是王易先生始终提倡的。

早在《国学概论》中,王易先生就已经提出,治国学者应明四端,即“辨真伪”、“知轻重”、“明地理”、“通人情”。这四端中,“辨真伪”和“知轻重”是方法论。清儒戴震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答郑丈用牧书》)“辨真伪”不仅要明辨典籍中的伪托伪说,更重要的是对于前人的学说、成论,要经过科学的辨别考证,不能盲目相信。同时,国学四区,学派众多,典籍浩茫,要善于总结,善于发现重点,也就知其轻重,不至于在前人茫茫无边的学说、文献中,失去方向,导致事倍功半,或徒劳无益。“明地理”,“通人情”,则是一种宏观的治学观。王易先生指出“学术之源,各有所托,地理关系,至切且深。”(《国学概论》)这里的地理关系,所指有两点,首先,我国古代学术派别,往往以地域乡邦分野划界,例如北宋的蜀学、洛学,到了黄宗羲撰成的《明儒学案》,也是以学者籍贯作为标目。“明地理”,首先在于了解以地理标目的各个学术派别。其次,地理知识对于国学研究,尤为重要,国学的重镇史学,地理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通人情”,则是充分了解古代的社会风俗、典章制度,乃至所研究人物的遭际经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贴近历史,还原历史,所作的考证和阐发,才不至于陷入主观或者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所持观点,正与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阐明的“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8] (p284)}的观点相一致。秉此四端,王易先生作了很具体的启发。例如在《大学讲札》^[9]中,他首先阐明“大学一篇,孔门一贯之道所由见也。”一贯之道,即儒家忠恕思想,忠就是尽力为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对弟子说: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大学》首言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蕴含了这样的“一贯”思想,明明德,是严格要求自己,彰明道德,也就是朱熹所谓的尽己;新民,是以彰明之德,推行至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朱熹所谓的推己,那么尽己推己,所达到的止于至善的境界,便是孔子所一贯倡导的“忠恕”。这里王易先生基本取朱熹的注解作为论述的证据。采用信说,便是“证实”的要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唯前人的解释是从,如王易先生并不认同朱熹以“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至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提出: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有一事,便有一理,那么世间有万物,通过穷尽物的“理”来认识物的本体,显然忽视了客观规律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性,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所以王易先生认为:

若如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至知,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大学讲札》)

通过已知之理,也就是通过总结客观规律来认识世界,是科学的、唯物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可见王易先生的治学方法,是贯彻于他著述当中的,这样证实的学术,也是可信可靠的。

四十年代的中正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各种讲座、学会不胜枚举。发表在1946年12月第四期的《中正大学校刊》上的《文字与文化》一文,是王易先生应当时中正大学春秋新闻社邀请而发表的一篇演讲。在这篇文章中,殊可以体会王易先生所提倡的,国学应当把致用作为目标。读书始于识字,是古人总结的至理。也就是说,文字是文化载体,不掌握一种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也就无法领略其文化所包含之内容。王易先生在申明此要义后,进一步提出文字具有推广文化、改进文化的功用。纵观历史,文化的演进,是以文字的改良更替为代表的,从甲骨文、金文演化至篆书,由篆书演变为隶书、楷书,以及历史上少数民族对汉字的吸收接受,中华文化圈中其他国家对于汉字的改造,无不证明文字推广文化的巨大作用。而文化的总结,则往往于整理文字开始。系统性整理承载一种文化所包含的典籍要义,无不是以文字的研究作为开始。正如罗塞塔石对于破译整个古埃及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在清代传统学术总结历代经学、史学、哲学的成就时,需求和应用,直接刺激了清代文字学的极大发展,也正是王易先生指出的,实际应用是保存和发扬文字的唯一途径。在研究中,文字学以致用为要,那么国学同样应以致用作为目标,服务于社会,才能使国学研究为有源头活水来,不断地向前推进。

学习国学,不仅是为了了解一个民族过去,更是为了总结和继承一个民族世代所积聚的智慧,正如王易先生所言:

虽我物质文明,不及欧美诸国,亦仅百余年之事,然断不可因此妄自菲薄,便一切舍己从人,须知我民族之命运实系于我悠久之文化,此吾人之所应深念者。倘狭义功利主义,舍国学而不讲,则民族精神将无所托,即令事事能学步他人,亦终于逐后尘而已。(《治国学之基本方法》)

那么唯有自信地坚守中国之文化本位,才能把握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国学,而王易先生治国学的基本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记忆的。

参考文献:

- [1]胡先骕.教育之改造[A].胡先骕文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 [2]胡先骕.本校成立一周年[J].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1,2(4).
- [3]王 易.文史季刊发刊词[J].国立中正大学《文史季刊》,1941,1(1).
- [4]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5]王 易.国学概论[A].大家国学·王易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6]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9]王 易.大学讲札[J].国立中正大学《文史季刊》,1941,1(2).

(责任编辑:张立荣)